



丝路高僧传

景天星
著

BIOGRAPHY EMINENT MONKS
OF SILKROAD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丝路高僧传

景天星
著

BIOGRAPHY EMINENT MONKS
OF SILKROAD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丝路高僧传 / 景天星著. —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17

ISBN 978 - 7 - 224 - 12162 - 9

I. ①丝… II. ①景… III. ①僧侣—列传—亚洲
IV. ①B949.9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31076 号

丝路高僧传

作 者 景天星

出版发行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 147 号 邮编:710003)

印 刷 西安市建明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6 开 26.5 印张

字 数 320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3 月第 1 版 201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224 - 12162 - 9

定 价 68.00 元



XUYAN 序 言

李利安

我对丝绸之路的兴趣是从大学时期就开始了。那时，我们学习中国古代史时总会涉及中外文化交流，而汉代的张骞、佛教的传入、中外的政治与经贸往来等都离不开丝绸之路。茫茫沙漠，皑皑雪山，阵阵驼铃，绵绵商队，总是让丝绸之路充满了神秘。1997年，我到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工作后，周伟洲先生曾邀约参加他主编的《丝绸之路大辞典》的部分词条撰写工作，虽然后来因为工作原因而退出，但在1999年又再次应周先生邀请出席了由他负责筹办的“中国西北大学·奥地利萨尔茨堡大学丝绸之路国际学术研讨会”，对丝绸之路的认识和兴趣也由此上升到一个新的阶段。与此同时，我相继承担了真谛、鸠摩罗什、鉴真等人的传记撰写任务，并在此基础上完成了长篇学术论文《鸠摩罗什与真谛入华前后命运同异之比较》，发表在台湾《中国佛学》第3卷第1期（2000年4月），从而对沙漠绿洲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有了更加切实的理解。

我的研究领域和研究生培养工作几乎都离不开丝绸之路。我的硕士

论文以《金刚经》研究为题，博士论文以观音信仰研究为对象。这两种佛教文化都产生于印度，然后经过海陆两种丝绸之路逐渐传入中国。我指导的博士研究生中，有的以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后的民间化为题，有的以弥勒信仰和普贤信仰研究为题，有的以鸠摩罗什入华传教为题，有的以阿育王信仰在印度的发展和向中国的输入与演变为题，这些研究都涉及丝绸之路上的佛教文化传播问题。这些年来，在博士和硕士招生的试卷中，我也多次以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传播为题，希望考生对丝绸之路所架构起来的中外文明交往有比较系统全面的理解，也希望考生对当下正在推动之中的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的宗教问题及其深远影响有比较清醒和准确的把握。

几年来，我还相继参加了多次与丝绸之路相关的学术会议。2013年9月20日至21日在西安召开的“文明自觉论”高层论坛上，我作了“丝绸之路与人类文明交往”的大会发言，首次提出人类文明交往四大阶段的看法。这四大阶段是：第一个阶段是前丝绸之路时期，世界各地分立性存在，相互没有贯通在一起，文明交往处于点状无线的状态，可称之为区内之路。第二个阶段是丝绸之路阶段，从前10世纪的周穆王西游，到战国时期秦国的西部经略，东方世界在努力向西探寻着交往之路，丝绸之路由此而初露端倪。而在西方，从波斯帝国向东西两侧的同时扩张，到马其顿亚历山大对中亚和南亚的远征，以及随后出现的印度孔雀帝国向中亚的突破以及贵霜帝国以中亚为核心向东西西南的三面扩张，西方世界也在努力探寻着向东延伸的通道，直到汉武帝时代因为政治联盟的需要而由张骞凿空西域，这条线路终于由一个行为主体而全线贯通。当然，后来还有东汉时期的甘英西行，从东方将丝绸之路进一步向西延伸。单一行为主体的全线贯通，超越了先期已经存在的接力式东西链接。第三个阶段是后丝绸之路时期，从15世纪末的地理大发现以及随之而来的西方殖民扩张，尤其是工业革命之后西方在全球的文化输

出和资本输出，人类文明交往的格局从丝绸之路时期的东西横线，变成了以欧洲为中心向世界各地发散状传播态势，丝绸之路时期人类文明交往的多极支撑、多元并尊、本土为基、时空递进、平等互补、友好和平等交往特征基本不复存在或失去主流地位，西方一极的强势挤压式文明交往成为那个时期直到现在人类文明交往的主体态势，这可称之为西洋之路。第四个阶段就是今天已经开始的信息化时代，地球上的任何一个地方的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团体都可以在瞬间传播相关资讯于世界各个角落，这可称之为互联之路。与此同时，全球化所带来的西方文化的强势挤压及西方文化缺失的日益明显，文化的多元化不但成为可能也是人类共同的期盼，东西文化的会通以及由此而来的人类文化的彼此融合将成为这一时期文明交往的基本趋向。总之，从人类文明交往的全部历史来看，丝绸之路承托起人类文明交往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阶段，并成为古代世界人类文明交往框架和世界文化格局及其互动机制的第一支撑。

2013年秋冬之交，应甘肃省委宣传部的邀请，我在北京出席一个专门为太湖文化论坛巴黎峰会出谋划策的一个丝绸之路论坛。我在大会发言中说，丝绸之路已经是一个历史的存在，挖掘丝绸之路精神底蕴对今天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同时，我也对这种精神底蕴进行了初步的梳理。此后在2014年6月7日至8日的宗教与丝绸之路高峰论坛暨2014年中国宗教学会年会上，我对这一观点又作了进一步的完善，但基本意思并没有改变。2014年7月3日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出席中吉“丝绸之路经济带研讨会”，在大会讲演中再次阐述了丝绸之路的精神底蕴。这些精神底蕴主要体现在：

第一，多极支撑的交往框架。与后丝绸之路时代的西方一极化不同，也与信息化时代越来越明显的随处可成极点的态势有别，丝绸之路在空间上始终是多极支撑的，其中最重要的是中国、印度、中东、欧洲四个极点，也可称之为四大桥头堡，尤其是西安、和田、碎叶城、阿拉

木图、德黑兰、白沙瓦、巴格达、大马士革、伊斯坦布尔、开罗、雅典、罗马等城市，更可谓丝路明珠。通过多点支撑，人类的多个文明中心彼此遥相呼应，并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联系在一起，实现了文明交往的相互协调与彼此依托，合作共赢的精神也由此成为一种潜在的力量维系着这条大通道的生命。

第二，多元并尊的交往姿态。丝绸之路所贯通的人类文明交往，保持了世界各地各民族本有文化的原本地位，中华文明、印度文明、阿拉伯文明、欧洲文明等人类主要文明体系之间通过丝绸之路得以相互接触，但互不压制，互不取代，彼此尊重，各美其美，既没有出现全球文化的一元化倾向，也不支持明确而强势的全球公认的普世价值，人类文化在相互并立中会通，在彼此呼应中共荣，呈现出存异并弘的文化生态和多姿多彩的发展取向。

第三，本土为基的交往意识。丝绸之路所贯通的文明交往，基本上都是在保持本土文化根基的前提下引进外来文化，通过对外来文化的扬弃，实现本土化转型，从而使自身的文化更加完善，更加有力。吸收外来文化过程中的本土为基模式以及不同文化交往当中的固本自强意识保持了丝绸之路沿线不同文明体系的个性，并使其没有因为丝绸之路的贯通而失去独立发展的足够空间，反而因为丝绸之路的馈赠而进一步激活其内部的机体，生发出新的力量。

第四，时空渐进的交往轨迹。在丝绸之路支撑的文明交往时代，无论是中国接受印度和中东地区的文化，还是印度接受西亚地区的文化，抑或是欧洲接受来自中东的文化，或者是一个文化区内的不同地域之间的相互影响，都经历了时间上的逐渐推进与空间上的依次传递，形成时空双重递进的文明交往轨迹。如在空间上，经过西域，南亚的佛教文化和中东的景教、祆教、摩尼教等进入中国；在时间上，从两汉之际到两宋之间，经过一千年之久，印度佛教文化才最终完成向中国的输入。经

过中间地带的传递和时间上的逐渐过渡的文化传播轨迹不但凝聚着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智慧，而且必然为时光流变与异域沙汰留下广阔的余地，从而保证了文化的平稳传播与自由交流。

第五，平等互补的交往原则。尽管在某个特定的领域内，尤其是在某个特定的地域内或某个特定的时段里，丝绸之路所贯通的文明交往也会显示出一定的不对等性，但总体上看，那个时期的人类文明交往具有明显的对称性和平等性，并在此基础上展开对等的互补式交往，不同文明体系之间在平等并立中积极吸收其他文明的长处，在宗教信仰、文学艺术、语言文字、手工制作、农业技术、畜牧方式、政治制度、衣食风尚、节庆民俗等很多方面相互借鉴，彼此影响，不同民族之间的彼此补益、互惠共荣成为文明交往的绝对原则。

第六，和平友好的交往秩序。在丝绸之路沿线的确发生过很多战争，但基本属于地区内或文明体系接壤地带的局部战争，属于地区内的军事争端或军事扩张，并非丝绸之路的直接产物，对于横亘东西的交往大通道来说，这也不是其历史存在的常态与文化演进的主脉。从丝绸之路所贯通的各种不同文明体系之间的关系来看，尤其是从中华文明、印度文明、阿拉伯文明、欧洲文明等四大文明之间的关系来看，他们之间始终保持着一种和平友好的交往秩序。不像新航线的开辟，随之而来的就是武力的征服与资源的掠夺，丝绸之路的开辟和长达两千年的延续没有战争的强加，这种和平友好的交往秩序确保了不同文明体系的独立并行与遥相呼应，这是当今人类应该借鉴的一种交往智慧，也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应该继承的一种交往秩序。

2014年2月27日，我应邀参加西安大唐西市的“四丝”项目研讨会，在其中的高峰对话环节，除了再次表达人类文明交往四大阶段的观点外，还对丝绸之路人类文明交往的内涵及其对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重要启示提出自己的看法，其中说：人类文明交往分别经历了区内之

路、丝绸之路、西洋之路和互联之路等四大历史阶段，从第一阶段的点状无线，到丝绸之路时期的东西横线，再到西洋之路的四周射线，直至今天开始浮现出来的全球网线，人类的文明交往先后见证了早期世界各地分立存在时期的无极，丝绸之路时期的多极，尤其是远东、南亚、中东、西欧的四极，以及西洋之路时期的一极，和今天超越一极与多极的、重重无尽的网络世界，呈现出丰富多彩的文明交往图景。丝绸之路的历史内涵呈现出六位一体的特征。观察行走在丝绸之路上的不同人群，我们可以看到，最持久的推动力来自怀着发财梦想的商人，最高规格的可能是怀揣皇上敕令的外交使节，最威风的则应该是由千军万马组成的军队，最浪漫的应该是远游探险与采风的边塞诗人，更激动人心的场面应该是沿着丝绸之路而大规模迁徙的不同民族，当然，我特别强调的是最后这一类人，这是最有影响、给后世馈赠最大的一种人，就是那些传播宗教文化的虔诚信徒。可见丝绸之路不仅仅是以丝绸贸易为主的商贸之路，而是商贸之路、外交之路、传教之路、军旅之路、漫游之路、民族迁徙之路等六位一体的文明交往之路。更重要的是，从今天的视角来看，那些行走在丝绸之路上的将军们消失了，穿梭于丝路的富商们更是难知其名了，当年怀揣皇帝敕令远走他国的使节们也隐蔽于历史的烟尘之下，唯有那些怀着虔诚信仰的文化使者，即使在当时的丝路上是最清贫的一族，但是因为他们信念的坚定、心灵的清静、精神的崇高以及对人类文明的重塑和对民众智慧的启迪，而永远载入史册，其生命也因此而获得永恒。对照历史，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丝绸之路经济带应该和丝绸之路文化带、丝绸之路地理带、丝绸之路政治交往带等多重内涵统一起来，以文化交往为支撑，以政治交往为考量，以经贸交往为主导，同时关注丝绸之路沿线的地质矿产与地理地貌尤其是沙漠化与环境变迁的相互影响。因为，从战略层面来看，丝绸之路经济带首先是出于政治的目的，这涉及国际政治与中国的国家安全，其次才是经贸，

彼此有钱可赚，经济获得发展，这是最实在而长久的动力，而这一切都必须建立在对丝绸之路经济带内的文化分布与彼此特性的认识的基础上，并以文化底蕴为支撑，以文化交往为先导，以民心相通为纽带，全方位地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

此后，我又相继多次以丝绸之路为题为多家单位作学术报告，其中比较重要的有2014年4月16日在西北大学导师讲坛第四讲主讲“丝绸之路与人类文明交往”。2014年5月15日和2014年6月7日两次应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邀请为其举办的干部培训班讲解“丝绸之路与人类文明交往”。2015年4月18日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为北京横山书院学员再次讲授“丝绸之路与人类文明交往”。2015年10月11日在广州中山大学为中大博研班讲解“文明交往史观下的丝绸之路”，并连续多次为省委干部培训基地讲授“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的宗教文化”课程。

此后，还相继参加了多次与丝绸之路有关的学术研讨会，比较重要的有：2014年11月19日出席并主持“丝绸之路佛教文化发展高峰论坛”；2015年8月29日出席“丝绸之路与泾川文化学术研讨会”，并作大会学术总结；2015年11月28—29日作为承办单位的负责人，具体筹办了“玄奘与丝绸之路学术研讨会”；2015年10月24日在第四届世界佛教论坛之“东来西去——丝绸之路上的佛教文明”新媒体论坛，与北京大学南亚学院印度研究中心主任王邦维教授，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院长郝春文教授，就丝绸之路上的佛教文化传播进行了学术对话。与此同时，《光明日报》理论版于2014年8月6日发表了 my 《丝绸之路：人类文明交往的历史足迹》，《中国宗教》2014年第7期也刊登了我的《丝绸之路的精神资源》一文。有关丝绸之路的一些调研成果也纷纷获奖，如《丝绸之路经济带宗教问题的最新发展与对策研究》获2014年度全国统战理论政策研究创新成果三等奖。从对丝绸之路历史的兴趣，到对丝绸之路经济带现实问题的关切，

视野的古今贯通与学术的理论结合，始终是我的努力方向。

当然，在古今偏重上，对丝绸之路历史上佛教文化传播的兴趣始终是占据主流地位的。而这种佛教文化的传播虽然也有政治家的推动以及经济交往所提供的平台，但最根本的原因还是信仰的力量以及这种力量所带动起来的宗教文化交流的内在驱动机制。在丝绸之路文明交往当中，尽管也有祆教、摩尼教、景教、伊斯兰教的传播，并分别为丝绸之路人类文明交往增添了灿烂的篇章，但时间最长、规模最大、影响最为深远的则是佛教的交往。丝绸之路佛教交往的核心内涵就是印度佛教向中国的传播。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来往于丝绸之路的取经僧和弘法僧则成为可歌可泣的担当者。在我的研究中，这些人总会闯入我的眼帘，在成为我研究对象的同时，也给我带来无限的感慨，并发出由衷的赞叹。例如，通过对法显的研究，我曾将法显精神概括为十点：坚定不移的信仰、心系佛门的悲愿、开创荒途的胆略、老当益壮的精神、百折不挠的意志、虚心好学的胸襟、善于考察的习惯、惜缘重友的情结、惜时勤奋的作风、眷念故土的情怀。通过对鸠摩罗什的研究，让我更深切地体会到那个时代印度、西域、中国内地三者之间文明交往的内在联系和鸠摩罗什在这一交往过程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在对真谛的研究当中，我曾经盛赞其学佛的经历与成就、学识与技艺之广博性、异域弘法之志向及远道来华的艰辛。正是他们的存在，丝绸之路佛教文化交往才呈现出千年持续的盛况，并积淀成一种人类文明交往的优秀模式。

2015年5月13日，我在中国佛教协会举办的“文明互鉴·弘扬玄奘精神座谈会”上，以玄奘大师为中心说明中印古代文化交往模式的五种特点，即：

第一，平等互鉴。以往学者尤其是一些印度学者特别强调中印文明交往是单向性的，印度对中国有巨大的影响而中国对印度文化贡献甚小。从佛教的起源及其向中国输入的成功这一点来说的确如此。由于中

国固有文化的缺失，尤其是从人性与人文密切关系的角度看中国文化的缺失，就更容易理解佛教在中国的弥补缺失的作用。因为人性具有生物性、社会性和精神性三重内涵，相对应的，应对人性需求的文化也有三大类型，即科技所支撑的物质文明，政治所支撑的制度文明，信仰所支撑的精神文明。中国的儒道文化分别以应对人性中的社会性和生物性为主，所以在制度文明和物质文明方面具有一定的基础，而在应对人的精神性方面明显缺失，于是以应对人的精神性为特长的佛教便获得了进入中国的天赐良机。佛教的传入，最终改变了中华文化的结构，重塑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从这一个角度讲，我们的确应该感恩古代印度的馈赠。不过，从另一方面来看，佛教是一种世界宗教，把世界范围的佛教作为一个整体来看，那么，古代中印之间的文明交往实现了佛教在地域上的拓展，在内涵上的革新，在时间上的延伸，使世界佛教史形成从印度到中国的发展主轴，其中前半段以印度的贡献为主，后半段以中国的贡献为主。当然，亚洲很多国家都为此作出了不同的贡献，但最重要的就是印度和中国，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古代中印在佛教文化交往方面处于一种平等互鉴的状态。再从文明交往的核心内涵来看，可划分为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三大类型。中国向印度学习精神文明的比重比较大，印度向中国学习物质文明的比重可能更大，如丝绸、纸张、钢铁等涉及民众日常生活的产品及其制作技术等都是从中国传入印度的，而在制度文明方面，两国尽管彼此影响很小，但也是一个互相借鉴的过程。即使从佛教文化的交往来说，中国对印度佛教的贡献也是不少的。例如玄奘在印度贡献了中国人的智慧，激发了印度佛教的发展，他的《制恶见论》和《会宗论》对印度佛教的完善和提升有积极的作用，他在印度的辩论、交流、讲法等对印度佛教起到推动作用，而玄奘对印度的记载，更成为后世印度佛教考古与印度佛教圣地重建的重要依据。另外，中国儒家文化也向印度传播，例如大量具有儒家文化背景的使节前

往印度，肯定对印度文化有所影响。儒家的孝观念在印度后期佛经中的出现，也很可能是受到中国的影响。到了隋唐时代，印度佛教高僧中很多都向往中国，像达摩笈多、金刚智、善无畏等人在印度时就向往中国，有些人更是以朝拜五台山为目的前往中国，可见中国佛教在印度已经形成自己的影响力。以上三个方面，都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印古代文化交往之间的平等互补性。

第二，圆融转化。就是指中印佛教之间的交往处于圆融发展的态势中，印度的僧人对中国佛教的本土化转型基本处于默认、宽容乃至支持的态度，这与其他一些宗教，尤其是一些一神宗教在向世界各地传播过程中对待本土化的毫不让步或缺乏灵活宽容的情况形成鲜明对照。从两汉到两宋，不断有印度僧人来到中国，他们通过经典的传译和佛教理论的阐释，对中国佛教走向正统化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即使有经典的框范和印度来华僧人的制约，中国佛教依然随时处于一种转型和变化之中，这是因为中国的文化传统和思维方式，尤其是中国的社会现实决定了中国人在信仰和实践佛教时必不可免地出现中国的特色，所以，印度佛教一旦进入中国，无论是印度僧人还是中国僧人，都无法左右佛教发展的本土化趋势。佛教在中国的发展是本土逻辑支配下的发展轨迹，这种逻辑就是本土各种因素牵引的一种发展秩序，是本土为基的一种文化交往，不但不颠覆和取代本土原有的文化，而且与本土原有的文化彼此呼应，顺流而变。印度来华的僧人对这种本土化变化尽管也有批评和引导，但并未发生激烈的冲突，总体上的理解和随缘的态度促进了佛教的本土化进程。除了印度僧人的宽容与默许之外，中国的佛教信仰者从一开始就主动对印度传来的佛教采取圆融的态度，避免了死搬硬套，也就避免了停滞不前。同时中国佛教创造性地发展出判教的理论，协调从印度传来的不同佛教派系之间的关系，使不同时间、不同地域产生的不同类型的佛教思想处于协调状态，避免了前后的冲突与正邪的对立，因为

发展而产生的变化与矛盾均被化解，从而为佛教在中国的本土化发展创造了更加宽松的环境。所以，佛教从印度到中国，无论在理论方面，还是在实践方面，均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和发展。中印文化交往中的这种圆融发展的交往关系是人类宗教传播史上十分可贵的精神资源，可以为基督教等其他宗教的中国化提供有益的借鉴。

第三，友好求真。就是说，中印佛教文化交往始终处于一种友好的和平的状态，没有武力征服，没有硝烟弥漫，甚至也没有彼此的怀疑与争吵，没有一方对另一方的威逼利诱和强势挤压，只有思想的交锋，智慧的碰撞，真理的求索，堪称人类文明交往的典范，可以为今天的中印交往乃至整个人类的文明交往提供积极的借鉴。中印两国在古代远距离遥遥相望，相互之间没有怀疑，没有冲突，也不像古代中国与周边小国之间的关系，往往会出现一些挤压乃至冲突，导致怀疑与平等关系的受损，造成延续至今的误解。不但两国之间没有战争，而且印度佛教本身也是一个和平的宗教，她所具备的圆融精神、慈悲精神、平等精神、忍辱精神、无住精神等都促成佛教传播的和平友好性，中印之间的佛教交往，只存在理论的争辩，思想的较量，交往双方拼的不是金钱，不是权力，更不是武力，而是智力，是思想，是灵性与信仰的力量。当佛教文化进入中国，也没有因此而发生宗教之间的战争。相反，如果有战争，佛教就难以传播，佛教的交往也会因此而中断或受阻。例如，13 世纪初因穆斯林统治者入主印度，佛教遭到毁灭；而在中国，13 世纪因金以及随后的蒙古族入主中原，中印文明交往急速下降，持续一千多年的繁荣时期宣告结束了。尽管印度佛教也存在自身独立性不断消解的原因，而中国佛教也存在简易化之后对理论需求的大幅度减少，但印度这个活水源头的中断也是中国佛教理论情趣减弱的关键因素，可见外族入侵不但对两国固有文化产生巨大的破坏，而且也严重阻滞了中印两国之间的文化交往。

第四，民间主导，中印文化交往是两国官方和民间共同推进的结果，留下无数永不磨灭的名字和可歌可泣的故事，而两者之中民间的力量始终占据主体。古代印度哲学家、思想家、宗教家在中印文化交往方面的故事非常感人，他们对中国取经僧的慷慨资助与指导，以及他们在抵达中国之后所经历的艰辛与所做的工作，都令人感叹，都非常可贵。同时玄奘、法显等大批中国求法僧，他们不畏艰险到印度求学，都是以非官方的身份进行的。总之，民间交往始终是中印文化交往的主体。

第五，绵绵相继。中印佛教交往，如果以玄奘为时间点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那么玄奘之前六百年，玄奘之后六百年，中印佛教交往的黄金期持续长达一千多年。在这一千多年之中，西去的求法僧和东来的弘法僧前仆后继，不绝于途，代代相承，绵绵相继，保持着不衰的兴趣，不变的热情，以及顽强的意志和惊人的耐性，正是一代又一代信仰者的不懈努力，印度佛教向中国的传播以及由此引发的发生于印度和中国本土的佛教交往，才呈现出绵绵相继的状态。

中印佛教文化交往的使者们前仆后继，在长达一千年的历史过程中，往来于丝绸之路，贯通中印两大文明圈，为人类文明交往史贡献了自己的智慧。丝绸之路上的高僧有如此重要的作用，目前关于丝绸之路的读物层出不穷，关于高僧的传记也是琳琅满目，但是关于丝路高僧的通俗性著作并不是很多。2015年，陕西人民出版社委托我主编一套“丝绸之路佛教文化丛书”，因为自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提出“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后，“一带一路”得到了沿线各国和国内沿线省份的呼应，30多个省市把这一战略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之中。而丝绸之路上的宗教文化又非常重要，其中又以佛教文化影响最为深广、积淀最为深厚、遗产最为丰富、持续最为久远。陕西省作为古代丝绸之路的国内起点，有其他省份无法比拟的佛教文化资源优势，因此要在丝绸之路文化研究和推广中作出更多的贡献。为响

应国家的重大战略实施，配合我省已经在各个领域进行的实际规划和建设，编著和出版“丝绸之路佛教文化丛书”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和重大的社会价值。该丛书拟为八本：1.《丝路西行的取经高僧》；2.《丝路东来的弘法高僧》；3.《丝路传入的佛教经典》；4.《丝路流行的佛教故事》；5.《丝路输入的佛教信仰》；6.《丝路遗存的佛教古刹》；7.《丝路遗存的佛教造像》；8.《丝路输入的佛教词语》。以佛教高僧、经典、故事、信仰、寺庙、造像和词语等为主要内容，以“丝绸之路”这一既具时间性又具地域性的概念为时空背景，勾勒出佛教文化在中外文明交往史上的历史画卷，是对佛教文化从一个新的角度进行的梳理和研究。其中强调丝绸之路上“东来”与“西去”两个重要互动环节，以突显中外文化交流优良的历史传统，并揭示丝绸之路文化属性的重要性。但是后来出版资助严重不足，出版社只好改为先出一本，其他的以后再说。在这种情况下，经过与编辑梁彩虹女士的协商，我们决定首先出版《丝路高僧传》。

在“丝绸之路佛教文化丛书”的前期策划过程中，李永斌也作了很多工作。但是出于各种原因，最后我把这一任务交给了我的博士生景天星。他此前曾经帮助我整理丝绸之路上的佛教传播，工作非常认真。这次，他通过系统的资料搜集、整理和撰写，从近900名丝路高僧（其中有近600名并未留下名字，仅有数据统计）中，遴选出上迄汉代，下至北宋的28位丝路高僧，其中西域东来的高僧有7位，印度东来的高僧有12位，汉地西行高僧有9位。这些高僧，大多都是他们所处时代的重要代表，而且不少是中国佛教史上的关键性人物。对每一位人物，都对其丝路行历、翻译或著述的主要典籍及其思想和贡献等作了全面的介绍。此外，还在书后附有四个表格：“印度东来僧人一览表”“西域东来僧人一览表”“丝路其他来华僧人一览表”“丝路西行僧人一览表”，这是非常重要的资料。对其中存在的一些个别问题，我也指出了出

来，希望他能继续修改，并且希望他以后在此方向有学术方面的重大突破。总之，本书作为一本关于丝绸之路高僧的通俗性读物，非常具有可读性，这在关于丝绸之路佛教文化的知识普及中，具有一定作用，而且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李利安

2016年5月18日